

多语接触背景下芒旺布朗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

朱欣蓉, 卿雪华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9日

摘要

布朗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其语言布朗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长期处于多民族共居、多语言接触的社会环境之中。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勐班乡芒旺村布朗族为调查对象, 综合运用问卷调查(110份)和半结构式访谈(10人)等方法, 系统考察芒旺布朗族的母语使用现状、语言兼用格局及语言态度。调查发现: 1) 芒旺布朗语保持总体稳定, 80.91%的受访者自评母语熟练, 但6~19岁青少年熟练率仅为59.09%, 代际弱化明显; 2) 汉语已普遍兼用, 傣语兼用明显萎缩, 三种语言在不同场合形成清晰的功能分工; 3) 语言态度呈情感上坚守母语、功能上拥抱汉语的复合结构, 母语传承期待正从家庭自然传承走向制度化路径。芒旺布朗族的语言生活体现了多民族交融进程中交融的语言发展路径。

关键词

布朗语, 语言使用, 语言态度, 多语背景

A Survey on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Village in Context of Multilingual Interaction

Xinrong Zhu, Xuehua Q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September 4, 2026; accepted: October 19,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9, 2026

Abstract

The Blang people are one of China's ethnic groups with a small population. Their language, the Blang

文章引用: 朱欣蓉, 卿雪华. 多语接触背景下芒旺布朗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调查[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590-602. DOI: 10.12677/ml.2026.14101031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Mon-Khmer branch of the Aust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 and has long been situated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multi-ethnic cohabitation and intensive language cont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Blang community in Mangwang Village, Mengban Township, Jinggu Dai and Yi Autonomous County, Pu'er City, Yunnan Province. By combining questionnaire surveys (110 responses)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10 individuals),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mother tongue use, patterns of language concurrenc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among the Mangwang Blang peopl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the maintenance of the Mangwang Blang variety remains generally stable, with 80.91% of respondents rating their mother tongue proficiency as fluent, yet the fluency rate among the 6~19 age group drops to only 59.09%, indicating a clear generational attrition; 2) Chinese is now widely used as a concomitant language, while the concurrent use of Dai (Tai) has markedly declined, and the three languages exhibit distinct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cross various domains; 3) language attitudes display a composite structure—emotionally attached to the mother tongue while functionally embracing Chinese—and expectations fo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the mother tongue are shifting from family-based natural transmission toward institutionalized pathways. The linguistic life of the Mangwang Blang people reflects a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integration without homogenization” amidst multi-ethnic interaction.

Keywords

Blang Language, Language Use, Language Attitudes, Multilingual Contex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布朗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 主要聚居于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等地区, 使用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布朗语。由于历史上长期与傣族、汉族等民族毗邻而居, 布朗族一直处于多民族共居、多语言接触的社会环境之中。语言符号所代表的事物和符号本身的形式是可以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即尽管语言具有很大的持续性, 但也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1]。近年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基础教育不断普及以及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布朗族传统语言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 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语言能力、语言选择和语言态度呈现出新的特点。

芒旺村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勐班乡, 是布朗族拉瓦话的重要分布地区。该村是因糯扎渡水电站建设而从原产地芒海集体搬迁至勐班乡的移民安置村, 全村常住人口 1422 人, 居住着傣族、彝族、布朗族、哈尼族、回族等 8 个少数民族, 其中布朗族约占全村总人口的 40% 左右, 主要集中于旺东一组、旺东二组、旺东三组。布朗族与汉族、傣族等民族长期共同生产生活, 在家庭、学校、宗教活动、市场贸易以及社会交往等多个领域形成了稳定而复杂的语言接触关系, 是观察民族地区多语背景下语言生活面貌的典型调查点。

本文以芒旺村布朗族为调查对象, 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 从母语使用、语言兼用和语言态度三个层面系统呈现其语言生活状况。文中所用材料来源于笔者 2026 年 4 月在芒旺村开展的田野调查。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10 份, 涵盖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职业群体(见表 1); 同时对 10 名布朗族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包括村干部、老年居民、中青年居民及学生等, 以获取语言使用背后的社会文化信息。

Table 1.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articipants (N = 110)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构成表(N = 110)

项目	类别及人数(比例)
性别	男 52 (47.27%)
	女 58 (52.73%)
年龄	6~19 岁 22 (20%)
	20~39 岁 35 (31.82%)
	40~59 岁 30 (27.27%)
	60 岁以上 23 (20.91%)
民族	布朗族 96 (87.27%)
	汉族 9 (8.18%)
	傣族 5 (4.55%)
文化程度	未上过学 24 (21.82%)
	扫盲班 5 (4.55%)
	小学 30 (27.27%)
	初中 29 (26.36%)
	高中/中专 16 (14.55%)
	大专 4 (3.64%)
	本科及以上 2 (1.82%)
职业	务农 26 (23.64%)
	打工 20 (18.18%)
	经商 15 (13.64%)
	学生 22 (20%)
	无业 16 (14.55%)
	教师 4 (3.64%)
	村干部 4 (3.64%)
	公务员 2 (1.82%)
	医护人员 1 (0.91%)

年龄是影响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的重要社会变量。本文将调查对象划分为四个年龄组：6~19 岁(青少年阶段)、20~39 岁(青壮年阶段)、40~59 岁(中年阶段)、60 岁及以上(老年阶段)，以考察布朗语代际传承状况。语言使用部分从“能力 - 领域 - 对象”三个层面展开：能力层面考察自评与词汇实测的代际差异；领域层面区分家庭、村寨、学校、公务、市场医疗和传统仪式；对象层面关注族内、族际、长幼和同辈关系。语言态度部分则区分情感认同、功能认同和行为倾向。

2. 文献综述

芒旺布朗族的语言生活处于布朗语、汉语、傣语长期接触的多语环境之中，考察其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需要置于语言接触、语言活力与语言态度等相关理论脉络之中。以下从语言接触、语言使用、语言借用与语言传承四个方面作简要梳理，以明确本文的理论基础。

语言接触研究方面, 国外以 Weinreich 的《Languages in Contact》(1953)为重要起点, 他认为双语者是语言接触的媒介, 语言借用、干扰与转移均源于双语使用者的语言转换[2]。Haugen (1950)进一步指出, 借用并非简单的语言复制, 而是语言成分在接触中不断被接受和本土化的过程[3]。Thomason 和 Kaufman (1988)强调社会历史因素比语言结构因素更能决定接触的结果, 不同强度的接触会分别引发词汇借用、结构干扰乃至语言转用[4]; Thomason (2001)又对接触的类型、机制及影响因素作了系统梳理, 主张将语言接触置于具体社会文化环境中综合考察[5]; Myers-Scotton (1993)提出的“标记模式理论”则揭示了语码转换背后交际对象、社会身份与交际动机等社会动因[6]。国内研究方面, 戴庆厦、袁焱(2002)提出“互补与竞争是语言接触的杠杆”, 为分析布朗语、汉语与傣语的功能关系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7]; 戴庆厦等(2005)以小陂流苗语为例, 表明语言接触不仅表现为词汇借用, 更可引起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变化[8]; 黄行(2005)指出长期多层次的接触会导致区域语言趋同[9]; 吴福祥(2020)将接触研究拓展到语法借用与语法复制层面[10]; 戴庆厦、丁玮明(2026)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民族语言接触研究的新任务[11]。上述理论将用于分析芒旺村布朗语的接触类型、借用层次与多语选择格局。

语言使用研究方面, Fishman (1965)提出的语言使用领域理论认为, 不同语言在家庭、学校、宗教、行政等场域承担不同功能, 领域变化是判断语言维持或转用的重要依据[12]; UNESCO (2003)发布《语言活力与濒危》, 提出以代际传承、使用领域、语言态度等指标综合评价语言活力, 为民族语言调查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13]。国内以戴庆厦为代表的民族语言使用现状系列调查建立了涵盖语言能力、语言使用、语言态度与语言传承的研究范式[14] [15]; 周锦国(2018)对云南民族学生的调查表明, 普通话使用频率不断提高, 而民族语言更多保留于家庭及族内交际领域[16]; 王远新(2008)、邬美丽(2008)等揭示了多语社区的语言功能分工与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17] [18]; 王浩宇(2019)指出, 多语兼用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的体现, 而非民族文化认同的弱化[19]。本研究将依据上述框架, 从代际传承与使用领域两个维度评估芒旺村布朗语的活力状况, 并借助语言态度视角考察村民对布朗语、汉语和傣语的实用评价与情感评价。

语言借用与语言传承研究方面, 黄成龙(2023)系统比较了我国民族语言借用汉语动词的类型及其制约因素[20]; 蒋颖(2024)提出借词研究应关注结构适应与功能适应, 深入揭示汉语借词在民族语言中的本土化过程[21]; 吕嵩崧(2021, 2023)探讨了接触引发的语法形式产生与语义演变[22] [23]; 敏春芳、宋珊(2021)、劲松(2010)则关注借用、干扰与语码转换之间的动态互动, 使借用研究由静态描写转向动态解释[24] [25]。在语言传承上, Fishman (1991)的语言转用理论认为, 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是民族语言维持的核心环节[26]; 我国实施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推动民族语言保护由抢救性记录走向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这些成果为分析芒旺村布朗语借词的来源、层次及其与语言使用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参照。

总体来看, 国内外相关研究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但现有个案多以阿昌族、苗族、傣族等民族语言为主, 对布朗族等人口较少民族语言接触、使用与传承的综合考察仍相对不足。布朗语属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 与研究成果积累深厚的藏缅、苗瑶等语族语言类型差异明显, 将芒旺村个案置于这一坐标系中, 既可检验“互补与竞争”杠杆理论与语言活力指标体系在孟高棉语族语言中的适用性, 也有助于通过与阿昌语、苗语等个案的比较, 揭示人口较少民族在多语交融环境中语言演变的共性与个性。本文以芒旺村布朗族为调查对象, 在民族交融视域下考察其语言使用与语言态度, 以期为民族语言接触研究提供微观语言社区的实证材料, 并为民族语言保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参考。

3. 芒旺布朗族的母语使用现状

语言能力是指人们在调动特有的语言认知能力基础上, 结合其他认知能力, 正确运用语言知识进行社会语言交际的能力[27]。芒旺布朗族生活在多民族共居的社区环境中, 其母语使用状况是了解该民族语

言活力的首要指标。以下从母语能力的代际差异、不同场合的母语使用情况以及母语稳定使用的条件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3.1. 母语能力的代际差异

不同年龄群体的母语能力差异是判断民族语言是否发生代际传承弱化的重要依据。调查数据显示(见表 2)，芒旺布朗族的母语使用情况呈现出明显的代际梯度，整体趋势是年龄越大，母语熟练程度越高。

Table 2. Native language use among Blang people of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Mangwang
表 2. 芒旺各年龄段布朗族的母语使用情况表

年龄段(岁)	调查人口	熟练	略懂	不会
6~19 岁	22	13 (59.09%)	9 (40.91%)	0 (0%)
20~39 岁	35	28 (80%)	6 (17.14%)	1 (2.86%)
40~59 岁	30	27 (90%)	3 (10%)	0 (0%)
60 岁以上	23	21 (91.30%)	0 (0%)	2 (8.70%)
合计	110	89 (80.91%)	18 (16.36%)	3 (2.73%)

从年龄段之间的递变来看，6~19 岁与 60 岁以上熟练率相差 32.21 个百分点，反映了布朗语在不同代际之间的显著变化。如果说 60 岁以上老年人代表了芒旺布朗族传统语言生活的样貌——几乎全民熟练使用母语，那么青少年一代则代表了现代化进程中布朗语面临的现实挑战，近半数的青少年已不能熟练使用母语。20~39 岁年龄段熟练率为 80%，明显高于青少年群体但低于中老年群体，说明布朗语传承的弱化并非始于当代，而是从更早时期就已缓慢发生；6~19 岁熟练率骤降至 59.09%，则反映了近年来城镇化加速、学校教育全面推广普通话、互联网普及等因素对母语传承的叠加冲击。

3.2. 不同场合的母语使用情况

语言使用场合是考察语言功能分布的重要维度。不同交际场合对语言选择有不同要求，通过分析芒旺布朗族在家庭、村寨、学校、公务场所、集市与医疗机构、传统节日与仪式等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布朗语的功能边界。

1. 家庭内部用语

家庭是语言传承最基本的单位，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状况直接关系到母语能否实现代际传递。芒旺布朗族家庭内部的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3 所示。

Table 3. Language usage within Blang families in Mangwang (N = 110)
表 3. 芒旺布朗族家庭内部语言使用情况表(N = 110)

交际对象	布朗语	傣语	汉语方言	普通话	布 + 汉	布 + 傣
长辈对晚辈	84 (76.36%)	5 (4.55%)	5 (4.55%)	0 (0%)	12 (10.91%)	4 (3.64%)
晚辈对长辈	73 (66.36%)	4 (3.64%)	6 (5.45%)	0 (0%)	20 (18.18%)	7 (6.36%)
同辈之间	70 (63.64%)	2 (1.82%)	9 (8.18%)	1 (0.91%)	20 (18.18%)	8 (7.27%)
对本族客人	88 (80%)	1 (0.91%)	9 (8.18%)	0 (0%)	8 (7.27%)	4 (3.64%)
对别族客人	27 (24.55%)	2 (1.82%)	57 (51.82%)	13 (11.82%)	6 (5.45%)	5 (4.55%)

由表格可以看出布朗语在家庭内部占据主导地位。长辈对晚辈交流时布朗语使用比例最高(76.36%)，对本族客人时更高达 80%，说明在族内交际和代际交流中，母语仍是第一选择。语言使用呈现代际层次。长辈对晚辈使用布朗语的比例(76.36%)高于晚辈对长辈(66.36%)，同辈之间最低(63.64%)。这一梯度变化说明布朗语在年轻一代中的使用正在逐步减弱，家庭内部的母语传承已出现代际衰减的端倪。“布 + 汉混用”的比例则随交际对象的年轻化而逐步上升，反映出汉语正通过年轻一代渗透进入家庭语言生活。

2. 村寨交际用语

在村寨日常交际中，布朗语仍是芒旺布朗族最主要的交际工具。芒旺布朗族村寨交际用语的具体情况如表 4 所示。

Table 4. Languages used for communication in Mangwang Blang village (N = 110)
表 4. 芒旺布朗族村寨交际用语(N = 110)

交际场景	布朗语	傣语	汉语方言	普通话
见面打招呼	47 (42.73%)	4 (3.64%)	33 (30%)	4 (3.64%)
聊天	49 (44.55%)	2 (1.82%)	25 (22.73%)	4 (3.64%)
生产劳动	49 (44.55%)	2 (1.82%)	27 (24.55%)	5 (4.55%)
跟好朋友交谈	64 (58.18%)	—	38 (34.55%)	8 (7.27%)
村里遇陌生人	44 (40%)	1 (0.91%)	27 (24.55%)	12 (10.91%)

调查数据显示，见面打招呼时使用布朗语的比例为 42.73%，聊天和生产劳动中均为 44.55%，均高于汉语方言的使用比例。与好朋友交谈时布朗语的使用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58.18%，说明在亲密关系中母语的情感纽带作用更为突出。

与此同时，汉语方言的使用也占有相当比例，这与芒旺村作为移民安置村、布朗族与傣族、彝族、汉族等多民族杂居的社区环境密切相关。在日常生活中，芒旺布朗族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村民交往，汉语方言成为跨民族交际的重要工具。村里遇到陌生人时村民会根据对方的外貌特征或初步交谈来判断对方的民族身份，从而选择最合适的语言进行沟通。

3. 学校用语

学校是芒旺布朗族语言使用格局最为特殊的场所。芒旺村没有自己的小学，适龄儿童到勐班乡小学就读，中学生到勐班乡中学就读。对 22 名 6~19 岁在校学生的语言使用情况统计如表 5 所示。

Table 5. Language usage in schools among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N = 22)
表 5. 芒旺布朗族学校语言使用情况表(N = 22)

交际场景	布朗语	傣语	汉语方言	普通话
课堂用语	0 (0%)	0 (0%)	1 (4.55%)	21 (95.45%)
课间与同学	2 (9.09%)	0 (0%)	10 (45.45%)	10 (45.45%)
食堂、宿舍	1 (4.55%)	0 (0%)	10 (45.45%)	11 (50%)

课堂上普通话占据绝对主导地位(95.45%)，教师全程使用普通话授课，学生回答问题时也全部使用普通话。经过数年的学校教育，芒旺布朗族青少年已普遍具备良好的普通话交际能力。课堂之外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课间休息时和在食堂、宿舍等生活场景中，普通话和汉语方言占据绝大部分，布朗语仅 4.55%。

这说明在学校环境中，汉语已成为青少年最主要的交际语言。但当交际对象是本民族伙伴时，绝大多数受访学生表示课后仍使用布朗语交谈，表明布朗语在青少年同族交际中仍有生命力。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学生确认学校对普通话的使用有明确要求，反映了学校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主阵地的功能定位。黄行认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在不同社会场域中发挥不同功能，两者具有互补性[28]。

4. 公务场合

公务场合是芒旺布朗族语言使用格局中汉语主导最为明显的领域。芒旺布朗族在公务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6 所示。

Table 6. Language usage in official settings among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N = 110)
表 6. 芒旺布朗族公务场合语言使用情况表(N = 110)

场合	布朗语	傣语	汉语方言	普通话
村委会会议	16 (14.55%)	0 (0%)	40 (36.36%)	31 (28.18%)
县乡政府办事	8 (7.27%)	0 (0%)	27 (24.55%)	55 (50%)

村委会会议中，汉语方言(36.36%)和普通话(28.18%)占据主要地位，布朗语仅占 14.55%。据笔者了解，村一级或组一级的基层干部一部分是布朗族，平时村里开会时有时仍可使用布朗语传达上级指示，但宣读正规文件时一般用汉语，同时用布朗语解释一遍。到县乡一级的行政部门办事时，普通话的使用比例进一步跃升至 50%，布朗语的使用空间则压缩至 7.27%，说明随着行政层级的提高和场合正式程度的增加，普通话的使用比例随之上升，布朗语的使用空间逐步缩小。

5. 集市与医疗机构

芒旺布朗族在集市与医疗机构中的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7 所示。

Table 7. Language usage in market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among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N = 110)
表 7. 芒旺布朗族集市与医疗机构语言使用情况(N = 110)

场合	布朗语	傣语	汉语方言	普通话
买卖交易	32 (29.09%)	1 (0.91)	40 (36.36%)	8 (7.27%)
看病就医	17 (15.45%)	0 (0%)	53 (48.18%)	20 (18.18%)

芒旺布朗族在集市买卖中的语言选择以汉语方言为主，布朗语次之，另有 15.45%的人兼用布朗语和汉语。村内小卖部由村民自己开办，仍以布朗语为主；但乡里商店的店主和集市里的商人多为汉族或其他民族，做买卖时一般用汉语交流，遇到布朗族商人时则用布朗语交易。医疗机构与银行等其他公共服务机构的情况与此类似，汉语是到这些机构办事的主要交际工具。

6. 传统节日与仪式场合

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等仪式场合是芒旺布朗族母语使用最为稳固的领域。芒旺布朗族在传统节日与仪式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如表 8 所示。

节日集会中布朗语使用比例达 64.55%，婚嫁场合为 60%，丧葬场合为 60.91%，均远高于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比例。大部分芒旺布朗族认为大型聚会以及婚丧嫁娶属于正式隆重的场合，承载着民族传统文化，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象征，在这些重要场合应当使用布朗语。

综合以上不同场合的语言使用情况，芒旺布朗族的母语使用呈现出明确的功能互补格局：布朗语负

责家庭与情感、传统与文化, 汉语负责教育与公务、对外与正式场合, 傣语则仅在特定族际交往中少量使用。三种语言各有分工, 共同满足着芒旺布朗族不同层面的交际需求。

Table 8. Languages used in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d ceremonial occasions among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N = 110)

表 8. 芒旺布朗族传统节日与仪式场合用语(N = 110)

场合	布朗语	傣语	汉语方言	普通话
节日、集会	71 (64.55%)	3 (2.73%)	6 (5.45%)	3 (2.73%)
婚嫁	66 (60%)	3 (2.73%)	6 (5.45%)	3 (2.73%)
丧葬	67 (60.91%)	3 (2.73%)	6 (5.45%)	2 (1.82%)

3.3. 母语稳定使用的条件

芒旺布朗语在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中依然保持稳定使用, 绝非偶然, 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 相对聚居的社区结构。芒旺村虽然是一个因糯扎渡水电站建设而形成的移民新村, 但布朗族在旺东一组、旺东二组、旺东三组中仍保持相对聚居。这种同族聚居的分布格局, 为母语的保留提供了天然的社区条件。在布朗族聚居的村民小组中, 布朗语仍是人们日常交际的主要工具, 无论是在路上相遇、在田间劳作, 还是在小卖部买东西, 听到的都是熟悉的布朗语。

其二, 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从调查结果来看, 芒旺布朗族家庭内部各交流场景中, 布朗语的使用均占据主导地位。多数受访者以布朗语为第一语言, 多数家庭坚持族内通婚(族内婚姻占 63.64%), 以布朗语为主的家庭语言环境保证了儿童在语言习得关键期能够自然获得母语。

其三, 语言政策的保障与扶持。国家长期以来坚持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原则, 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对布朗族等人口较少民族实施特殊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和法律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的支撑, 芒旺布朗族才能在现代化浪潮中既积极融入主流社会, 又坚守自己的语言文化根脉, 形成了“坚守而不封闭”的语言实践。

4. 芒旺布朗族的语言态度

语言态度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行为, 狭义语言态度指说话人对语言变化或变异项及其使用的情感认知和评价、前景期望和需求等主观要素; 广义语言态度还包括语言使用的行为倾向和实际表现等客观要素[29]。芒旺布朗族长期处于多民族共居、多语言接触的社会环境中, 其语言态度既体现了对母语的深厚情感, 也反映了对汉语实用价值的清醒认知, 是理解该社区语言生活深层动因的关键。

以下从语言评价、行为倾向和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4.1. 语言评价: 情感与功能的分离

语言的情感态度是个体对语言形成的情感联结和价值认同, 其核心体现为文化归属感、身份认同和情感依附[30]。语言评价包括对语言的情感认同(亲切度)和功能认知(实用性)两个维度。芒旺布朗族对布朗语、傣语、汉语方言和普通话四种语言的总体评价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语言认同是在社会互动和语言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的, 不同语言在不同社会场域中的功能分化, 是语言认同动态发展的重要体现[31]。

为了更加精确地测量芒旺布朗族对母语的情感认同程度, 问卷设置了六项陈述, 请受访者按同意程度从 1 至 5 分打分(见表 9)。

Table 9.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language attitude scale for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N = 110)
表 9. 芒旺布朗族语言态度量表统计表(N = 110)

陈述	平均分	“非常同意” 占比
布朗语是我的母语，我非常热爱它	4.88	88.18%
我希望布朗语能永远传承下去	4.85	85.45%
我觉得说布朗语很亲切	4.78	81.82%
我认为普通话非常重要，必须学好	4.67	74.55%
如果本族人不会说布朗语，我会觉得遗憾	4.45	64.55%
我在说布朗语时夹杂汉语词，感觉很自然	4.02	49.09%

六项陈述的平均得分均超过 4 分，总体均值达 4.61 分，说明芒旺布朗族的语言态度总体上是积极而稳定的。具体来看，涉及母语情感的三项陈述得分最高(4.78~4.88 分)，“非常同意”的比例均在八成以上，母语在芒旺布朗族心中具有近乎一致的情感认同。得分最低的是“说布朗语时夹杂汉语词感觉很自然”(4.02 分)，一方面说明语码混合已成为芒旺布朗族日常语言实践的常态，另一方面约三成人对此仍持保留态度，反映出部分村民对母语纯洁性的维护意识。

芒旺布朗族对布朗语与汉语在不同领域功能的评价进一步印证了上述特征(见表 10)。

Table 10. Comparative table of the Blang people’s evaluation of the functional domains of the Blang language and Chinese (N = 110)
表 10. 芒旺布朗族对布朗语与汉语功能领域评价对比表(N = 110)

领域	布朗语 “作用很大”	汉语 “作用很大”
家庭内部	91.82%	37.27%
村寨交际	82.73%	46.36%
结交本民族朋友	90%	35.45%
结交其他民族朋友	43.64%	62.73%
做生意	17.27%	90.91%
学校教育	12.73%	88.18%
了解政策	11.82%	89.09%
学习科技知识	14.55%	89.09%
学习本民族文化	50.91%	66.36%

芒旺布朗族对双语功能的认识呈现出高度一致的互补格局。李瑞华在研究民族贫困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时指出，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增强个体获取教育资源和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32]。在家庭、村寨、族内交往三个领域，认为布朗语“作用很大”的比例均超过八成，远高于汉语；而在族际交往、商贸、教育、政策、科技等现代公共领域，认为汉语“作用很大”的比例接近或超过九成，占据绝对优势。值得注意的是“学习本民族文化”一项，认为汉语“作用很大”的比例(66.36%)反超布朗语(50.91%)，这一方面与布朗语无文字、民族文化的记录和传播不得不借助汉文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汉语文已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辅助工具。

4.2. 行为倾向：开放与坚守并存

语言态度不仅体现为内心的情感和认知，更会外化为具体的语言行为和选择倾向。语言使用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社会场景中根据交流需求、文化认同及功能考量对语言的选择与应用，其本质是动态的社会行为，涉及对语言工具性与象征性的权衡。瞿继勇认为语言使用是语言人在与外界世界的沟通中，进行身份认同、语言认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最重要因素[33]。

1. 语言学习意愿

一个人最想学好哪种语言，往往反映了他对那种语言价值的最高认可。芒旺布朗族的语言学习意愿如表 11 所示。

Table 11. Language learning willingness of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N = 110)
表 11. 芒旺布朗族语言学习意愿表(N = 110)

最想学好的语言	人数	比例
汉语普通话	62	56.36%
本民族语(布朗语)	28	25.45%
英语	12	10.91%
当地汉语方言	7	6.36%
其他少数民族语言	1	0.91%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将普通话列为“最想学好的语言”，与表中普通话“最有用”(44.55%)的评价相互印证，说明对普通话工具价值的认可已直接转化为学习行为的动力。布朗语以 25.45%位居第二。这一比例看似不高，实则与母语能力的自我认知有关，芒旺布朗族母语自评“熟练”者约占八成，多数村民自视母语已经过关，学习需求并不迫切，“最想学好”的意愿自然指向母语之外的语言。英语(10.91%)超过汉语方言(6.36%)则是一个新的信号，在升学考试的制度推动下，英语已进入芒旺布朗族的语言需求结构。

2. 母语传承的态度

芒旺布朗族对母语传承的态度可以从多个维度加以观察。

Table 12. Attitudes of the Blang people in Mangwang toward mother tongue transmission (N = 110)
表 12. 芒旺布朗族对母语传承的态度(N = 110)

调查项目	积极(非常希望/希望)	无所谓	消极(不希望/反对)
希望学习本民族语	101 (91.82%)	8 (7.27%)	1 (0.91%)
希望孩子学习布朗语	94 (85.46%)	14 (12.73%)	2 (1.82%)
希望学校教本民族语	93 (84.54%)	13 (11.82%)	4 (3.64%)
希望广播/电视开办民族语节目	94 (85.45%)	16 (14.55%)	0 (0%)
希望看本民族语电影	94 (85.46%)	16 (14.55%)	0 (0%)
希望文艺活动用本民族语表演	90 (81.82%)	20 (18.18%)	0 (0%)

表 12 中呈现出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母语传承意愿的总体强度很高，六项调查内容的积极比例均在 80%以上，且这种意愿在“自我学习”与“代际传承”两个指向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村民对传承途径的期待已突破家庭边界，呈现出向社会化、制度化路径扩展的趋向。希望广播、电视、电影和文艺活动使用

民族语的比例也在 81.82%~85.46%之间, 与家庭内部的传承意愿不相上下。这一结构说明, 芒旺布朗族已不再把母语传承仅仅视为家庭内部的自然过程, 而是寄望于学校教育与现代传媒的共同参与。

3. 语言权利意识与社会压力

语言权利方面的经历为上述积极态度增添了一层现实底色。“交谈中对方改用汉语时您的反应”进一步呈现了这种压力下的行为选择: “马上改用汉语”与“觉得无所谓”合计超过半数, 体现了长期双语生活中形成的语码顺应习惯, 在族际交际中配合对方转用汉语, 已被多数村民视为交际的常态而非权利的让步。“坚持使用布朗语”与“很不舒服”合计约四成半, 则显示出母语权利意识的自觉, 这部分村民明确意识到语言选择背后的态度含义, 并以坚持或不适作出回应。四种反应的分布说明, 芒旺布朗族的语言权利意识正处于从自发顺应向自觉维护过渡的分化阶段。

4.3. 影响语言态度的因素

语言是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志, 认同具有主观性, 受政治、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心理等因素影响[34]。芒旺布朗族的语言态度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 受社区结构、经济发展和民族认同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社区结构与语言环境。芒旺村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社区, 傣族、彝族、哈尼族、回族等民族共处一地, 跨民族交往十分频繁。在这种环境中, 汉语方言是不同民族之间最便捷的沟通工具, 芒旺布朗族对汉语方言的积极态度正是对这种跨民族交往需求的自然回应。芒旺村距勐班乡镇仅数公里, 村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便捷, 频繁接触汉语广播、电视节目和互联网内容, 也使村民对普通话持开放接纳的态度。

社会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各种通讯手段融入芒旺布朗族的生活, 许多村民也纷纷融入城市化进程, 外出求学、经商或打工, 人们日益认识到普通话的重要性, 认为普通话具有较高的社会使用价值。同时, 语言使用状况的变化也导致一部分人的语言态度发生改变, 虽然芒旺布朗族对本民族的认同没有改变, 但随着普通话实用价值的增强, 一部分人对母语的行为倾向有所减弱。

民族认同与文化遗产。芒旺布朗族对母语的深厚情感, 源于语言与民族认同的深度绑定。多位受访者在访谈中表达了“布朗族不会说布朗语就不像布朗族了”的观点。然而, 芒旺布朗族也在积极寻求文化传承的新路径, 芒旺布朗族对母语传承的意愿并未减弱,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单靠家庭内部的自然传承已不足以应对挑战, 需要多方合力才能让母语真正留住。这种在情感与现实之间的平衡, 正是芒旺布朗族语言态度最真实的写照。

5. 结语

本文以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勐班乡芒旺村布朗族为调查对象, 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 从母语使用、语言兼用和语言态度三个层面系统考察了多语背景下芒旺布朗族的语言生活状况。基于调查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 芒旺布朗语的稳定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其稳定主要体现于中老年群体以及家庭、传统仪式等特定领域, 而青少年群体的语言活力已出现急剧下降, 母语传承面临现实危机。布朗语仍是家庭、村寨和传统仪式领域最主要的交际工具, 母语传承链条在中老年群体中尚基本完整。然而, 代际差异不容忽视, 布朗语传承的弱化并非始于当代, 20~39 岁年龄段熟练率(80%)已低于中老年群体, 而青少年熟练率的骤降则反映了近年来城镇化、学校普通话教育和互联网普及等因素的叠加冲击。

第二, 双语兼用格局清晰, 功能分工明确。汉语已成为普遍兼用的第二语言, 其使用能力与年龄、教育程度显著相关。汉语方言是村寨跨民族交际的主要工具, 普通话主要对应学校教育、公务场合和对

外交往, 傣语兼用明显萎缩。三种语言在各领域形成功能互补, 布朗语维系家庭和族群内部, 汉语承担现代公共领域交际, 傣语退居有限场景。

第三, 语言态度呈现情感上坚守母语、功能上拥抱汉语的结构。情感认同与功能认同的分离, 是在长期多民族交融中形成的务实语言观。在行为倾向上, 超过八成的受访者期待学校、媒体参与母语传承, 希望政府出台保护政策, 母语传承期待正走向家庭、学校、媒体、政策协同的制度化路径。

综上所述, 三种语言的功能分工目前尚属清晰, 语言接触尚未导致母语的消亡或单一语言对全部功能的覆盖, 而是在功能互补中形成了暂时的动态平衡。需要强调的是, 本文所呈现的“交融而不趋同”格局, 本质上是芒旺布朗族语言生活在特定发展阶段的一张共时快照, 而非稳定不变的终局状态。这一多语格局未来如何演变, 取决于家庭传承、学校教育与语言政策等多重因素的持续影响。就此而言, 芒旺个案既呈现了多民族地区语言生活在特定阶段的一种典型样态, 也为观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程中语言关系的动态演变及其潜在挑战提供了微观窗口。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资助项目“布朗语濒危方言景谷芒旺话调查记录与研究”(编号: 21XJA740005);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族交融视域下佤德昂语支语言接触中的语法演变研究”(编号: YB202666); 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民族交融视域下中缅边境直过民族德昂族语言认同调查研究”(编号: 2025Y1113); 2026 年教育部教育教学改革课题(中文与文化类专项)“语言接触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实践研究——以汉语与布朗语的接触为例”(编号: 2026JGYB043)。

参考文献

- [1] 苏金智. 语言接触与语言借用——汉语借词消长研究[C]//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III. 北京: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 2014: 73-83.
- [2] Weinreich, U. (1953)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Linguistic Circle of New York.
- [3] Haugen, E. (1950) The Analysis of Linguistic Borrowing. *Language*, 26, 210-231. <https://doi.org/10.2307/410058>
- [4] Thomason, S.G. and Kaufman, T.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5] Thomason, S.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6] Myers-Scotton, C. (1993) Social Motivations for Codeswitching: Evidence from Africa. Clarendon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8239055.001.0001>
- [7] 戴庆厦, 袁焱. 互补和竞争: 语言接触的杠杆——以阿昌语的语言接触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02(1): 95-99.
- [8] 戴庆厦, 杨再彪, 余金枝. 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以小陂流苗语为例[J]. 语言科学, 2005(4): 3-10.
- [9] 黄行. 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J]. 民族语文, 2005(3): 7-13.
- [10] 吴福祥. 语言接触与语法演变[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4): 23-33.
- [11] 戴庆厦, 丁玮明. 中国民族语言接触研究有待深化的五个问题[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6(3): 90-101.
- [12] Fishman, J.A. (1965) Who Speaks What Language to Whom and When? *La Linguistique*, 1, 67-88.
- [13] UNESCO Ad Hoc Expert Group on Endangered Languages (2003) Language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UNESCO.
- [14] 戴庆厦, 主编. 基诺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5] 戴庆厦, 主编.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及其演变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16] 周锦国. 云南省民族地区民族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分析[J]. 语言文字应用, 2018(1): 21-30.
- [17] 王远新. 多语言、多方言社区和谐的语言生活——湖南省城步县长安营乡大寨村语言使用、语言态度调查[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46-54.
- [18] 鄢美丽. 家庭语言使用的代际差异及思考[J]. 语言文字应用, 2008(4): 43-52.

-
- [19] 王浩宇. 民族交融视域下的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4): 16-22.
- [20] 黄成龙. 中国民族语言借用汉语动词的类型[J]. 中国语文, 2023(4): 387-401, 510.
- [21] 蒋颖. 21 世纪以来非汉语中的汉语借词研究述评(2000-2023)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3): 45-56.
- [22] 吕嵩崧. 语言接触引发的框式虚词及其演变推测[J]. 民族语文, 2021(6): 15-26.
- [23] 吕嵩崧. 语言接触阻断的语义演变——以壮语为例[J]. 民族语文, 2023(5): 19-31.
- [24] 敏春芳, 宋珊. 语言接触中的干扰和转用——以东乡语“些”为例[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49(4): 139-149.
- [25] 劲松. 语码转换和语言混合[J]. 民族语文, 2010(6): 39-45.
- [26] Fishman, J.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Multilingual Matters. <https://doi.org/10.21832/9781800418097>
- [27] 洪勇明. 语言能力: 定义、来源、内涵、结构、评估[J]. 语言与翻译, 2025(3): 49-56, 69.
- [28] 黄行. 论国家语言认同与民族语言认同[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4(3): 36-40.
- [29] 王远新. 语言田野调查方法[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25: 247.
- [30] 张先亮, 李妙文. 语言生态视域下的语言能力与语言认同[J]. 语言科学, 2023, 22(6): 567-569.
- [31] 高一虹, 李玉霞, 边永卫. 从结构观到建构观: 语言与认同研究综观[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1): 19-26.
- [32] 李瑞华. 精准扶贫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国家通用语言的教育价值探析——基于对青海省贫困藏区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J]. 民族教育研究, 2019, 30(6): 58-63.
- [33] 瞿继勇. 湘西地区苗族的语言使用与语言认同[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2(5): 73-78.
- [34] 王锋. 论语言在族群认同中的地位和表现形式[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42(4): 72-78.